

中国学生为何与国粹无缘

文/熊丙奇

最 近一期《南方周末》刊登了天津大三学生俞江的来信，他在信中说，“我们学校有许多日本留学生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看到他们的课表，课程有书法、京剧、太极……我好羡慕他们，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机会接触这些——小学没有条件，初中没有精力，高中没有心思——到大学什么都有了，但学校把机会都给了留学生。万一有天跟日本友人谈论京剧，也许他懂得比我还多呢！”（南方周末4月28日）

这一封短信，读来令人五味杂陈。作为中国学生，居然从小到大接触不到“国粹”，这是谁之过呢？

是大学的责任？是大学崇洋媚外，不给学生开书法、京剧和太极课？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据我所知，一些大学早几年就开设了这样的选修课，

以及相关的社团，可是选择这些课的学生相当之少——少得不能正常开班；社团活动也苦苦支撑——每次活动的“票友”极少，连举办者也灰心丧气。大约在五年前，复旦大学进行教育改革，设立“复旦学院”，让学生们在六大平台上接受通识教育，但媒体的调查显示，对于一年级学习“无用”的通识课程，不少学生很困惑：难道学这些有利于更好就业？

今天的大学，在就业的压力下，无论是学校还是学生，都更关注技能教育，通识教育已被冷落——从功利、职业角度看，教育确有双重功能，一方面是功利的、职业化的、技能化的教育，此即技能教育；另一方面则是非功利的、非职业化的、非技能化的教育，此即通识教育。技能教育可以帮助受教育者掌握职业所需知识和技能，

而通识教育却能提高一个人的素质以及发展潜能。一般而言，作为大学，应该重在培养学生的基本能力与素质，作为高职高专，则强调学生的就业技能培养。如蔡元培先生1917年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所言，“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，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，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，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，又何必来此大学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，为求学而来，入法科者，非为做官；入商科者，非为致富。”在就业率指标的逼迫下，几乎所有大学，都以就业为导向办学，通识课程被大幅缩减，增加的是技能课程、实践课程和实习环节，而这种调整，还被认为是“教育创新”。从学生看，一上大学，耳闻目睹大学生就业的严峻形势，所思所想就是找什么样的工作，并积极“做准备”，所以，普遍在学生中存在“工具课程热”、“考证热”。而不少专家，也告诫大学生，要成为职场的红人，在大学中实习是第一要务——这从根本上颠倒大学生角色的建议，还受到学生的热捧。

这就难怪理解为何在大学中，给留学生的国粹课开得轰轰烈烈，而国内学生却无缘了。

证书化学习、工具化学习和功利化学习，贯穿于我国学生求学生涯的始终，这种学习，读书的价值被严重扭曲，培养的就是工匠，而无法孕育出杰出的创新人才，更遑论大师级人才？

